

人地关系与新疆少数民族发展战略选择研究^{*}

易建平

内容提要：文章围绕新疆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的生存与发展战略问题，讨论了新疆的地理环境与人口结构、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的贫困化问题及其解决之道、扩大少数民族母语使用范围以解决其就业问题方案之可行性等问题，提出在新疆、尤其是南疆紧张的人地关系大背景之下，通过加强双语教育，提高国家通用语言和整体现代教育水平，从而增强竞争力；同时，提高文化适应力，扫除各种人文障碍，主动融入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当中，尽可能多地利用整个中国的空间与其他资源，不再继续生活在因封闭而贫困的环境中，才是新疆少数民族、尤其是南疆维吾尔族农牧民最好的战略选择。

关键词：维吾尔族 人地关系 双语教育 文化适应力

中图分类号：F127.8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30(2018)02-0077-10

作者简介：易建平，湖南师范大学历史与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潇湘学者（湖南长沙 410081），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长城学者（北京 100006）。

新疆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的贫困问题备受关注，其中，大多数人的贫困可以说是就业不足导致的后果之一，而这又与国家通用语言教育不足导致的竞争力不足有着密切关联。因此，从1990年代以来，尤其是从2004年以来，自治区人民政府在新疆大力推行双语教育。然而，针对新的双语教学模式，出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企图否定“双语教学”。笔者曾经就此进行讨论，认为它既经不住理论“考验”，也“经不住事实考验”。^① 本文在此基础上，继续探究双语教育与新疆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的生存与发展问题，顺便就反对新双语教学模式等观点进行讨论。

自然环境与人口结构

研究新疆问题、尤其是新疆少数民族问题，不能离开新疆的自然环境与人口结构。新疆总面积虽然在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最大（166.5万平方千米），宜居区域却主要是大小不等的几百个绿洲。由于荒漠戈壁的分割，较大绿洲之间往往距离很远。据2001年的数据，新疆区域内城市间平均距离达1000千米。^② 1949年以来，由于人口快速增长、人类各种有意识无意识的干预活动，绿洲总面积从2万多平方千米增加到16万平方千米左右，占新疆国土总面积的比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重大课题“民族区域自治与国家认同”（2014—20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易建平：《双语教育与新疆少数民族的“认知与行动能力”》，《新疆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

② 张军民：《新疆绿洲的生态环境特点及区域开发规律研究》，《兵团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

例从1.36%左右增长到近10%。^①而这些大小不等的绿洲上,集中了新疆90%以上的耕地和人口。荒漠戈壁多,绿洲少,绿洲人口密度也就高了,人均耕地也就少了。有学者在2000年代测算,新疆绿洲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高达二三百人,^②全区人均耕地面积快速减少,^③使得新疆成为我国土地退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人地关系越来越紧张。在新疆南疆的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和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以下简称“克州”)三地州,人多地少的问题尤其严重,其耕地面积总和仅仅占整个新疆的大约20%,但是养活的农业人口却占到了全区的将近一半。^④

新疆的人口结构与其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但分析起来,人口结构却更复杂。

首先是少数民族人口多。到2015年末,新疆总人口为2359.73万,少数民族人口占65.7%;其中,维吾尔族人口占大多数,为1130.33万人,占新疆总人口的47.9%,且多生活在南疆。2015年,维吾尔族居住于喀什地区的有414万人、和田地区有224.8万人、阿克苏地区有203万人,三地州维吾尔族共占新疆维吾尔族总人口的74.4%以上;再加上克州的38.9万维吾尔族,四地州维吾尔族共占新疆维吾尔族总人口的77.9%以上。南疆四地州的少数民族达到总人口的91.1%以上。南疆有的县维吾尔族人口比例更高。比如,维吾尔族占总人口比例,疏附县达97.8%、伽师县达98.2%、英吉沙县达98.3%、墨玉县达97.5%、皮山县达97.9%、莎车县达96.1%;^⑤和田地区维吾尔族占地区总人口比例为96.7%。^⑥以上数据还不包括维吾尔族无户籍人口。

少数民族多、农村人口多,与其高生育率有着密切关系。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数据,1989

① 1949年,绿洲总面积在2.25万平方千米左右,占新疆总面积的1.36%左右(钱云:《历史时期新疆绿洲的演变和发展》,《干旱区资源与环境》1997年第2期;穆艾塔尔·赛地、瓦哈甫·哈力克:《新疆绿洲系统自组织演化与机理》,《地理科学进展》2009年第5期);也有人认为,新疆绿洲只有2.05万平方千米(刘新平、韩桐魁:《新疆绿洲生态环境问题分析》,《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05年第1期)。之后,在人类干预下,绿洲总面积不断增加。上世纪90年代绿洲总面积约7万平方千米,约占新疆总面积的4%(原新:《新疆人口分布规律》,《中国人口科学》1994年第1期;钱云:《历史时期新疆绿洲的演变和发展》;穆艾塔尔·赛地、瓦哈甫·哈力克:《新疆绿洲系统自组织演化与机理》)。2005年,新疆绿洲总面积更是猛增到14.38万平方千米,约占新疆总面积的8.66%(白金凤、任玉冰:《基于RS/GIS的新疆绿洲动态变化研究》,《干旱环境监测》2006年第4期)。据2004年提供的数字,已经达到14.3万平方千米(依巴代提:《对新疆绿洲演变形势的分析》,《新疆水利》2004年第4、5期)。2010年,新疆绿洲总面积达到约15.64万平方千米,约占全疆总面积的9.54%。其中,天然绿洲与人工绿洲约各占一半(吴莹、吴世新、张娟、刘美:《基于多重时空数据的新疆绿洲研究》,《干旱区地理》2014年第2期)。最近的数据还在增加:新疆绿洲总面积已经增长到全疆总面积的9.7%(人民网,http://scitech.people.com.cn/n/2015/0803/c1007-27399378.html)。绿洲的过分扩大,降低了地下水位,最终降低了绿洲的生态系统稳定性(白金凤、任玉冰:《基于RS/GIS的新疆绿洲动态变化研究》)。

② 姜逢清、朱诚、穆桂金、胡汝骥:《新疆绿洲当代人地关系紧张情势与缓解途径》,《地理科学》2003年第2期;李周为、陆宗义:《农民增收要有新思路》,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2页;刘新平、韩桐魁:《新疆绿洲生态环境问题分析》。雍会在2006年甚至认为,新疆绿洲人口密度高达每平方千米352人,耕地人口密度高达504人,有些绿洲人口密度高达1100人以上(雍会:《新疆绿洲生态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06年第4期)。

③ 比如,1949~1997年,新疆人均耕地由0.279公顷下降到0.188公顷,下降约32.7%(姜逢清、朱诚、穆桂金、胡汝骥:《新疆绿洲当代人地关系紧张情势与缓解途径》)。

④ 李鹏:《农民转移就业的影响因素解析——以新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为视角》,《经济学家》2010年第7期。

⑤ 实际比例可能更高。2015年我们在莎车县调查时,该县公安局在与我们座谈时候介绍,维吾尔族人口占该县总人口的98%左右。他们的计算比例时候可能包括无户籍人口。

⑥ 以上数字根据《新疆统计年鉴2016》有关数据计算得来。参见http://www.xjtj.gov.cn/sjcx/tjnj_3415/,2018年2月19日查阅。

年总和生育率,百万人以上的民族中,哈萨克族达 4.74、维吾尔族为 4.65,分别位列第一和第二,都比汉族的 2.29 高一倍还多。^①追溯到有据可查的年代,根据苗普生考证,新疆维吾尔族在 1761 年只有 25 万左右、1776 年 32 万人左右、1831 年 65 万左右、1887 年 113.22 万、1908 年 157.5 万。^②1949~2014 年主要年份新疆维吾尔族人口的变化见表 1。

表 1 1949~2014 年主要年份新疆维吾尔族人口的变化^③ 单位:万人

年份	人口数	年份	人口数	年份	人口数	年份	人口数
1949	329.12	1953	360.76	1964	399.16	1978	555.53
1980	576.46	1985	629.44	1990	724.95	1995	780.00
1996	791.60	1997	802.00	1998	813.95	1999	825.03
2000	852.33	2001	860.56	2002	869.23	2003	882.35
2004	897.67	2005	923.50	2006	941.38	2007	965.06
2008	983.18	2009	1 001.98	2010	1 017.15	2011	1 037.04
2012	1 052.86	2013	1 074.41	2014	1 127.19	2015	1 130.33

如果以最早拥有记载的(《大清会典》)光绪十三年(1887)人口突破百万大关算起,到 2015 年的 128 年间,新疆维吾尔族人口至少增长了 1 117.11 万(2015 年的无户籍人口只算 100 万),增长的倍数超过 10.86,年均增长率达到 1.88%以上。

在南疆四地州,人口增长率更是远远高于整个新疆和全国。2012 年末,南疆四地州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13.65‰,较全疆的平均增长率 10.84‰高出 25.9%,为全国平均增长率 4.95‰的 2.8 倍;南疆年人口增长约 15 万人,年出生人口占全疆出生总人口的 60%以上。^④调查发现,在南疆,不少农民家庭生育 3 个孩子,甚至五六个。^⑤根据 2000 年的普查数据,南疆 45~49 岁的维吾尔族女性平均生育 4.43 个孩子。^⑥马戎认为,维吾尔族快速增长的人口和就业适龄人口规模,是近年来维吾尔族在城镇面临严峻就业问题和农业劳动者比例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⑦

人口增长过快、耕地受到沙漠戈壁限制,导致了新疆、尤其是南疆的农牧民人均占有耕地过少。根据 2006 年的数字,新疆人均占有耕地只有 3.2 亩;^⑧在南疆,只有 2.5 亩,其中,喀什 2.4 亩、和田 1.5 亩、克州 1.4 亩。^⑨2006 年,疏附县人均耕地是 1.7 亩。^⑩有学者甚至认为,在

① 马正亮:《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民族人口发展分析》,《人口与经济》2007 年第 1 期。有的学者认为,维吾尔族的女性生育数 4.65 位居全国各族之首(张天路、黄荣清:《中国民族人口的演进》,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 年,第 39 页;马戎:《新疆民族教育的发展与双语教育的实践》,《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8 年第 2 期)。

② 苗普生:《清代维吾尔族人口考述》,《新疆社会科学》1988 年第 1 期。

③ 艾尼瓦尔·聂机木:《新疆少数民族人口婚姻状况及其变动趋势分析》,《西北人口》2004 年第 1 期;《主要年份民族人口数》,《新疆统计年鉴 201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第 158 页;《新疆统计年鉴 2016》,http://www.xjtj.gov.cn/sjcx/tjnj_3415/2016xjtjnj_rkfy/201707/t20170714_539451.html (2018 年 2 月 13 日查阅)。

④⑤ 王忠山、陈虹、孙淑萍:《新疆南疆地区就业问题研究》,《新疆财经》2015 年第 1 期。

⑥ 黄荣清、赵显人,等:《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各民族人口的变动》,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年,第 138 页;马戎:《中国人口跨地域流动及其对族际交往的影响》,《中国人口科学》2009 年第 6 期。

⑦ 马戎:《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变迁与跨地域流动——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初步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 年第 6 期。

⑧⑨ 阿布都外力·依米提:《制约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流动因素的分析及其对策——以维吾尔族为例》,《黑龙江民族丛刊》2006 年第 5 期。

⑩ 马戎:《南疆维吾尔族农民工走向沿海城市——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劳务输出调查》,《中国人口科学》2007 年第 5 期。

喀什市、和田市、英吉沙县、乌恰县,农牧民家庭人均只有几分地。^①土地少、人口多,产生的结果自然就是富余劳动力多,这个问题在南疆尤其严重。到2013年末,南疆农村富余劳动力在新疆达到249.2万人,其中,南疆四地州占总数的62.8%,高达156.5万人。此外,新疆城镇居民要求就业的还有近60万人,其中,南疆有20万人。^②

还需要考虑的就是,在新疆、尤其在南疆农村,少数民族文盲、半文盲以及只有小学文化的人口比重较高。2010年,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统计,新疆合计就业人数总计497552人,其中71.96%的人只有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③2012年,新疆初中及其以下学历(包括未上过学)的就业人员比重依旧高达67.9%。^④在年轻一代的富余劳动力中,初中毕业生所占比重依旧较大。2005年,在喀什地区下属的11个县的初中升高中升学率,疏附县为15.5%、叶城县为8.7%、伽师县为11.2%、岳普湖县为12%、英吉沙县为13.5%、莎车县为14.5%。马戎认为,这些数字反映当时南疆地区农村劳动力就业的主要问题,就是初中毕业生的就业问题。^⑤之后,在自治区政府的努力下,南疆的高中升学率有了很大提高;但是,直到2013年,南疆四地州高中阶段升学率也只有73.0%,低于全疆平均水平15.7个百分点;普通高中升学率只有14.72%,低于全疆13.7个百分点。^⑥未能升学的学生就流向了就业市场。

贫困化问题及其解决之道

人多地少,富余劳动力多,总体上人均受教育水平不足、尤其是接受国家通用语言教育水平不足,劳动力素质不能满足就业市场的需求,因而就业严重不足,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新疆少数民族、尤其是农村少数民族普遍贫困化。这个问题在南疆尤其严重。2005年,新疆农村人均年纯收入2482元;和田最低,1296元;喀什次低,1698.53元。^⑦在喀什地区所属各县中,收入最低的塔什库尔干县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仅有1251元。2007年,全疆贫困人口285万,占全部农村人口的30%,其中30个国家级重点扶贫县贫困农牧民达到188.85万人。^⑧2013年末,南疆四地州贫困县占其全部33个县市的63.6%;如果再加上另外5个扶贫开发比照县市,南疆的扶贫对象占全疆的84.8%;仅仅喀什地区的贫困人口就占全疆贫困人口的五分之二。^⑨

从学术角度看,要想在可以预见的时期解决新疆少数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农牧民贫困问题,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从造成贫困的三个直接根源入手。

一是减少当地的人口,有效解决当地耕地与牧场不足的问题。不过,要想短时间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实行大规模移民,将富余的农牧民迁移到适宜生存、土地比较富余的地区,这样,留下来的人可以占有较多的土地。但是,在整个中国,耕地与牧场一直紧张,缺乏可以容纳大规模移民的尚未开发的富饶地区。因此,这在当前,可行性不大。

① 参见樊亚利、耿秋艳:《新疆农牧民转移就业:困难、原因与建议》,《新疆农垦经济》2014年第10期。樊亚利和耿秋艳另有一种统计说,南疆农业人口约占全疆的61.2%,但耕地只占全疆的41.3%,农牧民人均耕地只有3.29亩,仅为北疆地区农牧民人均耕地的40.5%。

②⑥⑨ 王忠山、陈虹、孙淑萍:《新疆南疆地区就业问题研究》。

③ 吴文娟:《新疆化解就业难题、发展就业产业的对策研究》,《实事求是》2015年第2期。

④ 辜胜阻、高梅、李睿:《就业是城镇化及社会稳定的基石——以新疆为视角》,《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

⑤⑦ 马戎:《新疆维吾尔族农民工走向沿海城市——新疆喀什地区疏附县劳务输出调查》,《中国人口科学》2007年第5期。

⑧ 李鹏:《农民转移就业的影响因素解析——以新疆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为视角》。

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考虑、也应该考虑,即,新疆尤其南疆的少数民族为了未来的生存与发展,也像全国大多数人民一样,实行有效的计划生育。^①不过,即便少数民族群众都愿意实行计划生育,并且,有效地实行了计划生育,最多也只是迟滞一下人地矛盾加剧的过程,并不能迅速、根本地解决几十年来已经恶化了的人地关系。如果不能大规模移民、又不实行计划生育,按照过去的人口增长率,新疆的绿洲、尤其是南疆的绿洲,早晚有一天根本不可能养活那么多快速增长的人口。以最早记载的人口突破百万大关的1887年的数据为基数计算,到2015年,新疆维吾尔族128年来的年均人口增长率达到1.88%以上。做一个极端的假定:如果人口增长率维持不变,再过128年,到2143年,新疆维吾尔族人口将超过1.3亿!如果生存模式依旧靠绿洲有限的土地吃饭、大多数人不能有效地使用国家通用语言获取先进信息、不能与全国其他各族群众交流,不能充分利用全国的空间与其他资源,新疆维吾尔族的未来生存与发展前景则很难想象。

二是在当地大规模增加耕地与牧场。这在新疆、尤其是南疆,干旱少雨、不少地区覆盖着沙漠戈壁的情况下,目前也根本不可能。

三是增强少数民族劳动力素质,增加他们的就业竞争力。目前,中央政府和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在努力这么做,其中最为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加强双语教育。无论是政府、还是绝大多数学者、抑或是渴望就业的当事人都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母语非汉语的少数民族除非增强其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与其他民族进行交流的能力,并以此获取与时俱进的现代化知识,增强自己的“认知与行动能力”,才有可能在就业市场上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扩展自身生存与发展空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在农村、尤其是南疆农村,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教育,让少数民族农牧民走出有限的土地,依靠全中国的空间与其他资源,才是他们根本的生存与发展之道。

农牧民占新疆维吾尔族的80%以上,他们能够生存、得到发展的机会,他们富足了,维吾尔族才能够发展,才是真正富裕了。否则,绝大多数农牧民生活在封闭、愚昧的状态中,因贫困,首先考虑的只能是如何维持全家基本温饱,这绝不是真正的维吾尔族包括维吾尔语言与文化的生存与发展正道。

知识分子关心本民族文化的传承,天经地义。但是,民族文化遗产的基础首先是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尤其是绝大多数当事人的生存与发展。忽视普通百姓不甚理想的生存状态、忽略他们追求发展寻求富裕生活的强烈愿望,仅仅关注自己挚爱的文化,这不是一位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应有的态度。我们知道,让孩子学好国家通用语言的少数民族家长当中,干部(按受教育水平,大多数应该也包括在知识分子之内,至少包括在普通的知识分子之内)与少数民族教师(包括大学教师)是最积极的那一部分。^②为什么别人的孩子、尤其是广大农牧民的孩子,最需要改善困难处境的绝大多数人的孩子,就不能通过学习国家通用语言而获得未来更好的生存与发展机会呢?!

^① 少数民族包括新疆维吾尔族群众,是可以接受计划生育观念的。参见马正亮:《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民族人口发展分析》。

^② 马戎:《新疆民族教育的发展与双语教育的实践》。作者在喀什调查时发现,比起双语学校或者双语实验班来,当地维吾尔族家长甚至普遍希望孩子上汉校,尤其是维吾尔族干部与双语教师。2007年,汉语学校喀什第十二小学计划招收名额是45名,报名的却达475人,其中主要是维吾尔族干部子女。疏附县双语实验学校校长说:“现在考不上二中(汉校)的维族学生才来我校。”许多“双语班”教师明确表示,第一志愿是送自己孩子进汉校。相似的情况在西藏也出现过。马戎特别提到,1987年,政府规定所有的藏族学生必须上藏语班,许多藏族干部对此不愿接受,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继续上汉语班。他们认为,自治区一级几大班子藏族领导干部的孩子都上汉语班,却要求其他藏族孩子必须上藏语班很不公平(参见郝时远、张海洋、马戎:《构建新型民族关系》,《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

比起城市来,新疆农村的双语教育条件和环境不好,这的确是事实。但在农村采取哪种教育模式并不能仅仅根据现有的条件和环境来选择,因为,这些是可以改变的。只要广大维吾尔族农牧民有愿望,政府就有责任、全中国人民就有能力帮助他们改变现有条件与环境,让他们与全国人民一道进入现代化的富足社会。何况,封闭贫困的社会(民族),面对一个日益全球化世界的强有力挑战,未必能够真正保护与发展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也肯定不能发展出在世界上拥有竞争力的文化。文化不能拥有竞争力,最终影响的将是这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实际上,在新疆农村,千千万万少数民族个体每天首先考虑的,并非自己民族在这个世界上有无竞争力的问题,而是全家当前最为基本的生存、能否脱贫的问题。他们脱贫了、获得了发展的机会,他们所属的民族也就拥有了竞争力。让他们拥有接受良好双语教育的权利,从而拥有走出封闭贫困生活的能力与机会,是维护他们民族包括其语言和文化最好的途径。

“扩大少数民族母语使用范围以解决就业问题方案”的悖论

我们无论是在西藏和四川的藏区还是在新疆调研时都发现有此类观点,认为只要在法律上扩大少数民族母语使用范围,让藏族和维吾尔族只要掌握了藏语或维吾尔语,不用掌握国家通用语言,便可以进入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以及国有企业工作,就可以扩大他们的就业途径与机会。

我们来对这种观点进行一些起码的可行性分析。

如今,要想进入政府部门或事业单位工作,必须受过良好教育。换句话说,这些单位岗位的竞争者主要是大学生。许多学者的调查也表明,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的第一意愿正是这些单位。^①但是,即便按照前述主张,让没有掌握国家通用语言的求职者可以进入,这些单位提供的职位也是十分有限的。学术界普遍认为,在西藏与新疆,财政供养的人员已经太多了;尤其是那些公益性职位,已经成为了财政和普通老百姓的负担,包括那些没有进入这些系统的藏族人和维吾尔族人的负担。虽然如此,政府依旧努力在提高财政供养系统中少数民族招聘名额。比如,在新疆,每年体制内就业的大学毕业生数量高达毕业生总数的约40%;2012年,中小学双语教育少数民族教师人数达5.6万,占全部双语教育教师6.27万人的89.3%;^②在南疆四地州,公务员招考中本地大学毕业生占到了招考总数的一半;在这四个地州,4万多名特岗教师,80%为少数民族毕业生,主要是维吾尔族毕业生。^③本来,在南疆,工商企业就少,老百姓就业就不足,农村相当贫困,地方公共财政自给率很低。2009年,新疆地方财政人均一般预算收入是1801元,而和田与喀什两个地区分别只有230元和380元,分别为全区平均水平的约12.77%和

① 一项在塔里木大学和喀什师范学院进行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学生选择愿意就业行业的次序是:政府部门、事业单位、自主创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连旭:《基于新疆南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的教育改革研究》,《科技文化》2015年第7期)。另外一项对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喀什师范学院进行的问卷调查表明,有45.15%的学生择业时最先考虑党政机关,有40.16%的学生最先考虑事业单位(李雪静:《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能力提升研究》,《昌吉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还有一项在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财经大学和喀什师范学院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希望去政府部门、事业单位与国企工作的分别占50.2%、31.9%和8.5%(吐尔地·卡尤木、买买提·喀尤甫、阿依古力·阿布力孜:《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观念的调查与分析》,《民族教育研究》2015年第4期)。

② 赵江民、符冬梅:《试论双语教学评价在新疆双语教育推进中的作用——以新疆少数民族中小学双语教学现状为例》,《语言与翻译》2013年第4期。

③ 孙婧、王向然、朱娜、殷继明、杨圣敏:《新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问题的调查与分析》,《西北民族研究》2012年第4期。

21.09%。^①2013年,南疆四地州GDP总量仅为全疆的16.9%;三次产业就业之比为63:10:27,工业化水平低于20%,第三产业大都以政、教、科、文、卫等政府主办的公共事业为主;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只有309家,仅占全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13.9%;城镇化率也比全疆平均水平低了差不多一半,只有21.8%。此外,据2012年的数字,南疆四地州人均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只有全区平均水平的1/3,地方财政自给率只有18.3%。在这种情况下,南疆四地州一般公益性岗位的数量却占全区的40.3%。^②先不说入职人员工作上是否可以胜任,要让那些没有掌握国家通用语言的大学毕业生进入财政供养系统,无非是将那些已经掌握了国家通用语言的少数民族干部职工挤走,这对提高少数民族就业率并无任何帮助。只有增加了财政供养人员岗位,才有可能增加就业机会;但是,增加了那样的岗位,就增加了普通百姓的负担,包括当地少数民族普通民众的负担。从另外一方面看,那也是将本来可以用于帮助当地少数民族普通百姓的资金,用于帮助那些接受过更多教育的少数民族大学毕业生。

仅仅依靠扩大公务员队伍、扩大国有企事业单位编制、从宽招聘未能掌握国家通用语言的人员,是不可能解决当地少数民族数百万富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的。客观情况虽然是这样,各级政府还是在尽其所能地扩大财政供养系统与国有企业少数民族招收名额。王延中、元林君概括了新疆促进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的9条主要政策与措施,其中第3条:开发农牧业技术、医疗卫生、治安管理等以及双语教师、幼儿园教师等公共服务岗位;第4条:实施未就业毕业生赴对口支援省市培养计划,对口支援的中央企业要结合援助项目建设,积极吸纳当地高校毕业生就业;第7条:开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农牧业生产指导等基层公益性岗位,并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和公益性岗位补贴;第8条:各专门项目招募人员时要向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予以倾斜;第9条:少数民族聚居区招录公务员、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招用员工时,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③9条当中,与此相关的占了5条。另外第1条:摸清就业困难的少数民族毕业生人数;第2条:加强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国家通用语言培训、就业技能培训,也是与此相关的基础措施。政府在这方面所下力气不可谓不重。不过,这总不是长久之道。少数民族大学生不能主要依靠纳税人供养,这样下去纳税人养不起;并且,这对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其他少数民族群体也极端不公平。国有企业招聘,即便照顾少数民族应聘者,数量也有限。何况,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优先考虑的还是企业本身的生存与发展;需要照顾的员工多了,企业的经营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在任何一个实施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政府机构与财政供养的单位都不应该、也不可能成为社会主要的雇主,否则一定是这个国家民众的灾难。社会最大的雇主应该是各种所有制、各种规模的企业。是企业,就应该按照市场规律运作。一个企业,在当今中国的绝大多数地区,包括新疆的绝大多数地区,如果不使用国家通用语言交流与工作,要想生存下去、做强做大,定会困难重重。

在当地由政府强行扩大少数民族母语使用范围从而扩大该群体就业机会,这种主张的基础是将拥有少数民族身份的中国公民仅仅看作是该自治地区的公民。这种观点的实质与结果是,将少数民族圈于当地,失去中国其他地区巨大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少数民族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的积极性也将大大降低,与其他民族民众交流获取其他生存与发展机会的愿望同时将大大减弱,封

① 赵强:《新疆少数民族就业状况及存在问题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② 王忠山、陈虹、孙淑萍:《新疆南疆地区就业问题研究》。

③ 王延中、元林君:《民族地区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及对策》,《劳动经济研究》2015年第1期。

闭因而贫困的生活将会继续。一旦失去特殊照顾,普通民众的基本生存保障恐怕都会成问题。

近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基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任何一种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生产力要素包括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都是基本的前提,公民的迁徙自由又是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一步步打破原来各种各样的行政限制,推进迁徙自由的实现从而促进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的实现。在这种形势之下,少数民族应当积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与政治社会变化,而不能继续维护过去将自己禁锢的各种人文障碍。一位不能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少数民族,离开本民族聚居的地区寻找工作的机会就少了,从而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的机会就少了。即便在本民族聚集地,许多其他民族人士开办的企业还是使用国家通用语言展开工作。如果不懂国家通用的语言,去这样的企业寻找工作,又怎么会有竞争力?!即便是本民族人士开办的企业,难道就不需要同不懂该民族语言的群体打交道吗?他们不需要在技术、装备、原材料等上下游市场上与不懂该民族语言的人打交道吗?即使仅仅在新疆本地,就聚集着55个民族。大多数员工连国家通用语言都不懂,这样的企业即便只想在新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做大做强,恐怕也并不容易。因此,一位老板如果拥有自主权(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其他所有制企业),怎么可能愿意仅仅雇佣只懂得本民族语言而不能跟其他民族商户与客户交流的员工?!马戎在新疆基层调研时发现,即使一些维吾尔族的公司老板,也不愿意雇佣单纯以维吾尔语教学的学校毕业的学生。^①企业老板这样做是出于实际利益的考虑,有着压倒一切的合理性。政府可以强令财政供养单位与国有企业招收不懂国家通用语言的人员,但是,很难强令其他所有制企业也这么做。的确,我们也发现,也有专门服务于本地区、使用本民族语言的企业。比如,在四川省甘孜,就有许多专门的藏传佛教用品商店;在新疆南疆农村,就有那种专门服务于本地居民的生活用品商店。这也说明,其他民族人士如果能够学好当地语言,也会扩大自己求职的机会。但是,即便那样一些小商店,如果老板和店员能够懂得国家通用语言,至少也可以从进货渠道上扩大范围,从而,在价格、商品质量上,选择能够多一些,这对小企业的生存发展仍旧十分重要。

当然,问题的核心还不是专门服务于本民族小企业本身的发展,核心在于,在藏区、在南疆,这样的一些小企业,即便百分之百地雇佣本民族员工,也远远不能解决这些地区日益扩大的少数民族劳动力失业与就业不足的问题。^②

提高文化适应力主动融入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新疆的有些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族,当今最为迫切的,应该是怎么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冲出围困自己的各种人文障碍,不再继续生活在封闭因而贫困、因而不利于整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之内。封闭必然与贫困落后相联系,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对于维吾尔族也不会例外。要想走出封闭的环境,自立于中华民族之林,在当今,只有通过双语教育学好国家通用语言,提高“认知与行动能力”,也就是谋求生存与发展的竞争力,以利用整个大中国的空间与机会,与全国各族人民携手进入富足的现代化社会。除此之外,恐怕别无他途。

学好国家通用语言、充分利用新疆的就业市场,这是第一步,但还远远不够。要完全容纳富余劳动力,新疆目前的就业市场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走出新疆、充分利用中国其他地区尤其

^① 马戎:《从现代化发展的视角来思考双语教育》,《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2年第3期。

^② 在新疆,仅仅非农业人口中的维吾尔族15岁以上的“未就业人口”,在2000年就达到134.8万人,2010年更是达到了177.7万人(马戎:《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变迁与跨地域流动——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初步分析》)。

是发达地区的资源,是少数民族解决就业问题、加快进入现代化社会的一条有效途径。中央是看到了这一点的。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指出,要有序扩大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到内地接受教育、就业、居住的规模;李克强也强调,鼓励新疆群众到内地就业。

不过,走出新疆不仅仅是需要克服语言障碍。有学者调查表明,目前阻碍新疆维吾尔等少数民族走出去寻找生存发展机会的,最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是文化,包括宗教与生活习惯。一项关于新疆“农牧民外出打工面临的主要困扰因素”的问卷调查,在12个备选项中,回答最多的是“生活不习惯”,占比高达60.5%,高于“语言不通”选项达20%(问卷为多项选择,故合计大于100%)。^①另外有一项针对塔里木大学和喀什师范学院的问卷调查表明,99.2%的同学因为“饮食困难”而不愿意前往内地发展。^②有观点认为:“维吾尔族在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方面与大部分汉族人有比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有时会影响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往,故不便在内地就业。”^③正因为如此,在新疆以外地区生活的维吾尔族人,直到2010年才有68 044人,这远远少于在藏区以外生活的藏族54万人的数量。^④两相比较,恐怕不难得出结论:维吾尔族在生存与发展的开放性与适应能力方面,甚至远远不如藏族。^⑤因此,一方面,政府有责任帮助新疆少数民族在新的地区获得文化生活的便利;一方面,新疆少数民族自己也需要改革创新自己的文化,尽可能地适应新的环境,以增强整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能力。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宗教与生活习惯,如果不能帮助本民族绝大多数人拓展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就需要改革与创新,帮助这个民族走出去获取自己在世界上应有的地位。

当然,在当前的形势之下,由于暴恐分子活动的恶劣影响,其他地区的人群也对新疆人民走出去存在着种种顾虑;并且,做出了种种限制,甚至包括一些违法违规的歧视性限制。少数民族走出新疆,除了自己需要努力之外,也需要其他地区的民众克服障碍,进行帮助。新疆劳动力要素流动的成本可能比其他地区人民流动的成本要高很多;但是,无论成本多高,都很值得去做。

① 樊亚利、耿秋艳:《新疆农牧民转移就业:困难、原因与建议》。

② 连旭:《基于新疆南疆少数民族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的教育改革研究》。

③ 阿布都外力·依米提:《制约少数民族农村劳动力流动因素的分析及其对策——以维吾尔族为例》。

④ 马戎认为,2000~2010年,如果扣除将近2万多“新疆内高班”学生的数字,在内地的新疆维吾尔族流动人口的实际人数还在下降。新疆在外流动人口的数字中,如果考虑政府组织的跨省劳务输出,个人主动寻求外地机会的人数就更少了(马戎:《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变迁与跨地域流动——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初步分析》)。

⑤ 1982、1990、2000和2010年,在藏区以外生活的藏族人口分别为24.2万、30.4万、41.5万和54万,分别占我国藏族总人口的6.25%、6.62%、7.67%和8.6%。1990、2000和2010年,在新疆以外地区生活的维吾尔族人口分别为15 179、53 771和68 044人(马戎:《关于当前中国城市民族关系的思考》,《西北民族研究》2009年第1期;马戎:《中国人口跨地域流动及其对族际交往的影响》;马戎:《我国部分少数民族就业人口的职业结构变迁与跨地域流动——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初步分析》)。有学者分析2000年人口普查千分之一抽样数据后得出结论,居住在所出生省以外人的比重,全国平均为6.2%、少数民族为3.7%,其中维吾尔族出省者仅占0.2%。省际迁移流动率,藏族为0.8%、维吾尔族为0.1%。两个民族都较低,但前者高于后者8倍。中国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人口迁入率(1995~2000年迁入数对期末人口数的比率)最高的是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达26.9%;新疆喀什地区和克州等地则不足1%。这最终反映:新疆少数民族劳动力绝大多数封闭在新疆境内。新疆农村富余劳动力高达180万人,占全部农村劳动力的44%,但外出打工的只有1%。新疆少数民族流动性低、新疆以外民众流动性高,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新疆人出去少、外地人进来多:每年新疆外出务工和经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平均只有2万人,外地进疆务工人员却超过了100万。毫无疑问,这极大地加剧了新疆少数民族就业的压力(张善余、曾明星:《少数民族人口分布变动与人口迁移形势——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分析》,《民族研究》2005年第1期)。

帮助了新疆千千万万困难的普通少数民族民众，最终也将给整个中国的进步与发展夯实基础。

全国人民都需要认识到，新疆民族问题的核心不仅仅在于少数民族是否认同中国，同样在于全国人民是否认同这些少数民族。只有真正实现了双向认同，这些少数民族可以自由地在中国大地任何一个地方寻找自己的发展机会，新疆的民族问题才有可能彻底解决。

少数民族如果能够有意识地努力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也就是在努力融入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反之，自身现代化的过程也许会很漫长，也许不会那么顺利。个别少数民族如果不能与其他大多数民族一样，对整个中国拥有主人意识，而在语言、宗教以及其他文化上永远强调自己的特殊性，将自己与其他民族隔离开来，因而将自己在地理上与社会上都封闭起来；同时人口过高的增长率又不能有意识并且有效地加以控制，那么，早晚有一天，人地关系在新疆许多绿洲的有限空间内将会紧张到无法调和的地步。其实，这种关系已经十分紧张了，近几十年来民族问题愈益尖锐，就是其典型的表现。直白地说，新疆的绿洲空间太小了，容纳不下快速增长的人口、尤其是文化上继续封闭因而“认知与行动能力”受到很大限制的人口。

当今世界，个别持有特殊文化（尤其包括宗教）的民族，不是自己在与自己进行战争，^①就是在与别的民族进行战争，这种现象是不是应该促使我们进行研究，看看文化、尤其宗教文化封闭性与过度增长人口之间的关系是否本身就是放大马尔萨斯理论效应的核心因素？文化如果是封闭的，富余的人口肯定更不容易找到出路，继而必然导致过度增长的人口与土地等有限资源之间的关系加倍紧张；资源匮乏到一定程度，不同群体间为此产生的矛盾必定十分尖锐。

责任编辑：刘欣

^① 新疆少数民族的有识之士也看到了这一点。2015年我们在新疆师范大学调研时，一位维吾尔族研究生反对分裂的两大理由之一就是，一旦分裂成功，伊斯兰教不同教派之间就会打起来。

Abstract: Food security is not only the basi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lso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article, the author studied the issue of unbalanced global agriculture chain, and based on the data of four kinds of China—imported grain in recent years, used the Spearman formula and the VAR model to test the “big country effect” empirically in China’s grain import trade. Through the empirical test, the author found that there is no connection among the import volume of the 4 major grain crops, domestic prices and international prices. China’s grain import trade deviates from the “big country effect”, which shows that China’s grain import trade is in a dis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o balance the gap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grain in China, evade the unfairness of grain import trade and safeguard China’s food security, the author comes up with the strategy of “going global” for grain production of China.

Keywords: agricultural industry chain, import trade, food security, “big country effect”, “going global” strategy

A Study on Man—land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Xinjiang

Yi Jianping (77)

Abstract: The article, focusing on the subsistence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Xinjiang, especially Uygur people, discuss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and population structure, the poverty of ethnic minorities, and the way to reduce poverty, and the solution for the unemployment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Xinjiang. The author proposed that we should strengthen bilingual education, enhance national commo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modern education to increase competitivenes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Xinjiang. In addition, the author proposed efforts for ethnic minorities to increase cultural adaptive capacity, eradicate man—made obstacles, integrate themselves into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of China and make full use of the space and other resources of China, and no longer live in the poor and enclosed environment, which is the best strategy for ethnic minorities, especially Uygur peasants and herdsmen in southern Xinjiang.

Keywords: Uygurs, man—land relationship, bilingual education, cultural adaptive capacity

Three Modes of World Anarchy—Criticism on Winter’s Culture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s

Cao Xing(100)

Abstract: The world has entered the era of mankind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but many countries still confront each other as enemies.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ubject of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o study the model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how to turn better. So far, the best research on the differing states of anarchy has been the theory of three cultures built by Constructionist Winter, but Winter has not explored the roots of three cultures.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ethic roots of three states of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which is a new try in the cultural studies of world anarchy. This study is of important ethic valu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search, and given the issues of Korean peninsular, the Middle East, Kashmir, South China Sea and Diaoyu Islands, the stud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s far as the US is concerned, China should take the strategy that it is best to become friends, dare to be opponent, and not afraid to be enemy.

Keywor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ulture model,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Hobbes culture, Locke culture, Kant culture

“Neo—Ottomanism”: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Influence

Zhang Xiangrong(108)

Abstract: “Neo—Ottomanism” emerged in Özal Era(1983—1993) and has come into being af-